

新观察



众声喧哗 杂树生花

——作家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近日,在“众声喧哗,杂树生花——20位作家云上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新书发布会上,邵丽、李修文、徐则臣、张莉、弋舟、张楚等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批评家齐聚互联网直播平台,从各自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出发,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何为短篇小说的调性

邵丽:每个小说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追求调性。构成小说调性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小说的结构、表达的把握、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字数和断句方式等等,多种因素混合而成才构成小说的调性。调性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有时候作者自身也很难把握,自己满意的作品读者未必感兴趣,不太满意的东西却意外被认可。因此,作家找准调子很重要。这些故事将读者带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用特写的镜头、恰切的色调讲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生存,如何尽自己一切力量在逆境中活出勇气、活得体面、保有尊严且心怀敬意。从我自己的创作体会看,调性是不不断调整的。年轻时的作品追求精致、唯美、浪漫,但这些个体感受很难引起更多读者共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多了,懂得了那种疼痛感,哪怕很小的一部作品也要找到“痛点”。巴金老先生有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要。

李修文:于我而言,调性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帮我具体地分辨和亲近那些有着各异声音的个人,并且最终感受到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内聚力。许多时候,我们写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是我们作为写作者深入这个世界的深度和难度。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的时候,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我们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调性。我特别重视今日生活里的真实力量,我会去走近那些真实的人,去听他们讲故事,但我绝不是非虚构,我想我是在用材料的真实去建造一种美学上的真实。在很多时候,“新异”并不仅仅意味着向外看,它还包含着向内看、向古典里看,我们的古典传统里埋藏着许多可以重新激活今日生活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可能是完全符合我自身气质的,所以,这样写下去的念头也就越来越笃定了。我是那种需要生活和创作彼此袒露、彼此见证的写作者,而这样一条“说书人”的道路,令我沉醉和不断感受到“新异”带来的刺激。

徐则臣:判断一个作家的“调性”要考虑三个方面:所操持的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作品呈现出的风格与作家内在的气质。调性首先文体上要协调。我们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有一个基本判断:首先是从篇幅、节奏、密度等因素去判断它是不是短篇小说,能否区别于中、长篇小说;其次是作品呈现出的风格,有着作家鲜明独特的修辞风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与气质,一个作家不可能一辈子都用假嗓子说话,文终须如其人。三者结合成一体之后,呈现出的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调性。

弋舟:我们说到调性这个词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某种独特的个性,但同时,我也想说隐秘的共性,那是文学之事内在的标准。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这本选集中,主编张莉把这20个短篇选在一个集子里面,一定有一个内在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之下,她确认了这20位作家内在的文学调性。当然,这种共性的表达又是各有声色的,但我相信,大家必定有着隐而不宣的根本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选集重申了我们的文学理想,并将大家聚在一起,重启我们的文学生活。

短篇小说的新异性

张楚:这部年选确实是一部充满了调性和异质性的小说集。我觉得有些小说在文本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说《逛超市学》,它没有故事内核,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叙事者在进行一种自我精神状态的塑造,《沙鲸》《诞生》则是原小说叙事,《我亦逢场作戏人》完全是民间艺人在说书。另外一些小说对新旧世界的裂缝和精神冲突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比如《天台上的父亲》,其他的小说也都在用独特清晰的声音,为我们呈现短篇小说那种“骆驼穿过针眼”的魅力和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陈崇正:短篇和长篇一样,都需要一个故事内核,当然长篇更具复杂性,但其实跑起来也不需要担心开始和结束,比较舒服,而短篇则不一样,需要瞻前顾后、反复思量,方寸之间见功夫。所以,短篇小说有自己的难度,对各种难度的攻克,也就形成小说不同的调性。由此看来,优秀短篇小说的调性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我非常喜欢逛寺院,我喜欢看十八罗汉,喜欢欣赏他们的神情和动作。小说有长篇和短制,在我看来,长篇应该是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而短篇小说就应该是罗汉,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丰富各异而又非常有表现力。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可以像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无论是抡着棒子还是手结封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优秀短篇的调性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特质。比如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有包浆,技巧内藏,让它圆熟、可触摸,语言克制、叙事扎实。另一些同样优秀的短篇却充满了明目张胆的叙事圈套,有一种刺眼的光辉和锋芒,充满对固有叙事模式的挑战。

卢德坤:调性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我们知道,文无定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自己的调性。我想,调性是跟每个人的阅历、识见、心性,以及偏好的美学方向有关系的。当然,还跟我们身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同样的,跟调性一样,我觉得新异性也挺难把握。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有时候如果追求一种特定的、看上去挺花哨的形式,出来的效果可能还不如平平实实去写。理想的状态,新异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另一方面,我觉得,写作者可以在心中设立

一个自我认可的标准。这样说好像挺正经的,好像是个什么硬性规定,其实不是,但我相信作家可能会感觉到这样一个标准。随着识见的深入,这个标准也可能会起什么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主要还是跟文学自身,跟求真这两件事有关。如果有一种确信了,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内核了,那就坚持它,调性没准就这样发展出来了。这是理想状态,我没达到,但我挺向往的。

王姝蕻:我从事的是互联网行业,所以留给写作的时间非常少,当我把一整年的时间攒巴攒巴,也只够写一个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写什么”就尤为重要。《比特圈》这篇以比特币为题材的小说,实际上没有硬核高科技,它写的是人,而科技隐退到人的身后,成为背景。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异”题材,但在这个题材中,我希望呈现的不是它与寻常生活的“异”,而是希望呈现它们的“同”。这个“同”在于,无论什么甚嚣尘上的新技术、新思想、新生活,剥开表层,藏在里面的终究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比特圈》这篇小说最终呈现的调性,我觉得是“野艳”。野艳是我的一个执念。这个执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第一次读到弋舟老师的《随园》,真的是“野艳”。这样的小说它怎么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写出来的,而且弋舟的爱好还是盘核桃。作为女作家,我觉得应该挑战它。

林培源:说到小说的“调性”,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风格”,比如卡夫卡小说的荒诞、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鲁迅的冷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抒情、张爱玲的苍凉……在我的理解中,新异就是“新奇+异质”,但如果将这种“新异”扩大开来,它不过是构成“调性”的一个方面,因为新异会让我们想起“陌生化”。小说要有调性,一是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小说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息和味道,这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别人无法取代的。“陌生化”作为一种小说的手段和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是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甚至故事,陌生化就是将读者从日常的认知、思维和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告诉你,小说也可以换个方式写。我理解中的短篇小说的“调性”,还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比如地方方言的使用,某种地方风情在小说中的渗透。总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融入其中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只有真实自然才能打动人。

“众声喧哗”意味着 容纳不同的美学和调性

张莉:很难用术语表达何为小说调性,它与作家的语言方式有关,比如使用白话还是文言文,这代表了作家及人物价值观的取向,但就整体而言,小说调性的建立恐怕更多与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氛

围相关。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人世的的不同理解。理想小说的写作技术、语言风格、故事氛围、人物关系等各个要素必须是相得益彰的。关于成熟作家,我眼里的新异性在于他的这篇小说是否能够呈现出他的新素质、他的新风格,要和他以前的小说有变化。对于年轻作家而言,我更看重作品的创新性和异质因素,哪怕他的作品有所欠缺,但我还会抱有期待。这本《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是2019年一个从近200部短篇小说中挑选而出,经过不断的筛选、比照、纠结,最终确定下来。我不能说它们是最优秀的,但它们是2019年度短篇小说作品中最别具魅力与调性的。其实我希望这本年选容纳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调性,所以才叫“众声喧哗”。而且中国的年选也很多,各有追求,它们体现不同批评家的审美和标准,这也是一种众声喧哗。

邓一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写什么和怎么写不仅是写作问题,也是人类生存问题。对于我来说,它是冲突和悖论的现实。新异性是对大量同质化的反思,而这种常规写作仅仅提供了表象的现实,那不是真正的现实。但我们正活在这样的现实中。文学如何表现荒诞而异质的现实,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张柠:调性是一个音乐术语。调性对于短篇小说而言,首先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像语言的节奏、节拍,叙事起伏、缓急。一个成熟作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调性,但当他更为成熟时,调性反而会退居其次,精神性的东西会压倒这个调性。《刘玉珍》这个小说的调性除了形式上的,还有精神上的,那就是童年的乡土社会的经验,是一种不适、不安、不满,和它形成的讽刺和悲愤。生活在这种比较贫苦背景之下的农民农工,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心灵中留下了印记,我觉得它们在我的小说里呈现出来了。如果说形式上的东西还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不同,那么精神上的调性是不会过时的。

张惠雯:健康的生态应该就是众声喧哗、杂花生树。小说是一门艺术,应当千人千面、风格各异,每一个风格其实都有它的魅力和光彩。在今天的小说界,我们不仅应该重视我们一直推崇的那种关于时代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还应该去重视关注私人生活的、关于家庭和情感各种关系的精致的写作。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小说家去关注社会的底层,也应该鼓励他们把目光放开,看到社会的层面。

■新作快评

张学东短篇小说《被狗牵着的女人》《长城》2019年第5期

深入生活的肌理

□张富宝

读到《被狗牵着的女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卡夫卡日记中的那句话:“一个笼子去寻找一只鸟。”这句话依然可以视作我们这个时代之人最为真切而深刻的生存隐喻。“笼子”一如高悬的命运之物,一如无处不在的局促而紧迫的生存环境,成为渴望自由的“鸟”无法摆脱的梦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处境已被翻转和规训为“一只鸟在寻找一个笼子”的秘密律令。在我看来,今天的写作不是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而是为了不断捅破那个“笼子”,揭示那些幽暗丛生的真相。短篇小说《被狗牵着的女人》即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测现实的视窗。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时代,伴随着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无数碎片化的存在,我们越来越陶醉在一个镜像化的“完美世界”之中,变得越来越孤单与自恋。今天的时代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改变着人类的情感结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在这种情境之下,文学的写作也越来越远离鲜活生动的现实,日益沦为话语狂欢的修辞游戏。张学东的写作有效克服了这些病症,他具有将当下生活迅速提升为艺术的能力,绝不是简单地复述故事或者呈现事实,而是在力因逼近暗流涌动的生存真相,重新思考其背后隐匿的人性动机与社会心态,进而揭示现

代都市尤其是家庭中日益加剧的波澜与纠葛。在一个老龄社会与独生子女社会的背景之下,这种写作尤其体现出可贵的“介入性”与“现场感”。

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它不仅要深入真实入微的生活肌理,同时更要真切地面对当下复杂的生存境况。《被狗牵着的女人》充分显现出作家的写实能力,也保证了文学想象的自由延宕,赋予了作品以最大的真实度、可信度与思想空间。人与狗的关系在现代都市的家庭结构中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牵着狗的伦常已经被狗牵着人的现实所替代,成为一种愈来愈突出的都市生活景观。狗不再单纯作为一种“宠物”而存在,而更是具有了“人”(伴侣、朋友或子女)的伦理意味。因此,人与狗的相互依赖以及人与狗的最终冲突,其实涉及的是当下社会家庭结构与伦理秩序的瓦解与坍塌,反映的是现代都市人的情感残缺、精神病候与心理困境。在张学东的小说中,那个被狗牵着的中老年女人,在丧偶的孤独生活中,再次被卷入照看外孙的琐碎辛劳之中,结果几乎无可避免地遭遇了卡布狗咬伤外孙的惨痛悲剧,而她长期被空置和长有肉瘤的乳房,最终成了一种不堪的生存隐喻,让人心生寒意。

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说:“小说作者需要拥有或者习得的那种让小小说别具深意的眼光,我称之为‘洞悉隐秘意义的眼光’,这是一种能够从一个生活的景象或处境中看到各种不同现实维度的眼光。”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眼光,正如张学东通过被狗牵着的女人的故事给予我们的那样:生活从未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精致和完美,而是充满了难以规避的残缺与划痕,这或许才是最后的真相,虽然有些残酷,却能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

■短评

微光的相逢

——读石钟山《向爱而生》 □冯祉艾



石钟山的小说大多聚焦于生活本身,他擅长在人物身上挖掘光芒,书写裂缝之中的真实情绪,来对新时代的社会境况做出注解。新作《向爱而生》讲述的是当代的缉毒故事,别出心裁又颇具叙事张力。作为犯罪题材的小说,石钟山选择了另一重角度来对新时代的形象以及精神进行了诤歌。

在石钟山的笔下,无论是警察宋杰还是他失去的妻子杨雪,抑或是承载了两个身份的冯晓雯,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微光的力量。四野茫然之下,黑暗固然可怖,但那一点微光也足以成为向前奔跑的力量。面对生活的裂缝,也唯有微光之间的互相弥合,才能镌刻更深沉坚定的篇章。

小说书写的是犯罪题材,就自然避免不了对现实残酷图景的书写,因而,在这诸多裂缝的痕迹之下,人物弧光的显现就尤为明亮。石钟山在书写这类题材时往往笔触锋利尖锐,在犯罪事实的写照上极为深刻,但同时,他对于人性的描绘也呈现出一种灰蒙蒙的、柔软的光芒。在这种笔调之下,小说所显现出的温情更疏落有致。

这种温情最开始是通过宋杰的儿子小满所展现的,小说并未一开始就揭露杨雪的死亡,而是通过小满的情绪侧面反映。对于死亡的书写其实在犯罪题材的作品中并不罕见,《向爱而生》选择了以孩子的视角来感知母亲的去世,这时的自我保护比起撕心裂肺的哭喊更多了一层茫然与未知。我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无知无觉令我们害怕,而孩子失去了母亲,却要在众人善意的谎言中被欺瞒。没有人能够对这种伤痛泰然处之,而孩子天真灿烂的笑脸下所暗藏着的永恒悲剧,令人更感受到一种彻骨的悲凉。

而当小满和天堂里的妈妈联系上之后,“他对书包里的手机异常珍爱。在他眼里,手机里装着妈妈。手机放在书包里,书包里就躺着妈妈。以

前他都是把书包背在身后,现在上学放学,他都把小小的书包抱在怀里。书包里藏着他和妈妈的秘密。有秘密的小满是幸福的。”小说人物冯晓雯的力量也展现在此,面对一个幼年丧母的孩子,一个失去了生活情感依托的人,她无私地、柔软地奉献了自己的爱。往后我们方才明白,冯晓雯自己其实也处于人生的裂缝之中。

冯晓雯即将结婚的男友于浩然陷入毒品的漩涡自救而不得,之前的美好回忆与现状的对比只能令人在撕扯的裂缝中越陷越深。于浩然是天真的,当他吸毒的时候,他“只是笑,笑得格外灿烂,格外纯真。半晌道:什么毒,说得那么难听。这是跟神交流的工具。”于浩然的死对于冯晓雯来说,既是失去爱人的悲恸,也可以说是另一重

解脱,因而冯晓雯和宋杰的结局完全处于情理之中,而于浩然的死亡真相,也揭开了另一重裂缝下的人物弧光。

小满的父亲宋杰,他的撕扯在于妻子的去世和孩子的懵懂,他既不能放纵自己沉溺于悲苦,又不断地被孩子提醒悲伤。冯晓雯的裂缝是过去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她一边沉浸在过去的温情中不可自拔,在心知肚明的罪恶中自我回天,只能在这种崩塌的裂缝中痛不欲生。小说巧妙地将宋杰与冯晓雯的裂缝借助一个电话号码的巧合加以弥合,孩子小满拨给天堂妈妈的电话竟然打到了冯晓雯的手机上,两人心照不宣地维系着这份欺骗的温情,而两人之间共同的关于爱的线索,也令一个原本残酷沉痛的故事走向了相对温暖的结局。

《向爱而生》无论是在行文痕迹上还是人物角色上,都呈现出一种规整的情感逻辑,展现了以爱为审美倾向的生命主题。小说之所以能够从犯罪题材小说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强调了这一情感逻辑之下的诚挚微光。尽管披着一层悬疑破案的外衣,但无论是人物在苦难中挣扎向前的勇气,还是微妙光亮之间的互相吸引,都呈现出了一种绝对的命运色彩。此外,小说中所展示的爱的主线是极符合情感逻辑的,冯晓雯和宋杰的感情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融合过程,两人的感情从小满开始,也最终以一个孩子的出生作为新的起点,代表着生活的传承和爱的永恒。

在小说中,克制而荒诞的情节流转之下,人心和社会不断地在失常中走向恒定的毁灭。石钟山编织着一切的感官体验,书写着宿命般的悲剧终点,而他又没有将这种悲剧限定在黑暗之中,而是选择以一种更为温柔的方式展示了人性的暖热。无论是宋杰对妻子杨雪的爱,还是冯晓雯与宋杰之间的暗生情愫,都堪称是决绝刚烈而又深沉浪漫的爱。